

# 法律诚信与道德诚信辨析

刘李明,冯云翔

(哈尔滨工业大学 人文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摘 要]** 道德诚信是指作为道德准则的诚信,要求人们言语真实、恪守诺言,强调的是行为人的操守和自律;而法律诚信作为一项法律原则,是指当代各国在法律上尤其是在私法上普遍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它强调的是规范与监督。违反道德而失信于人,可能会遭受舆论的谴责和良心的诘问。法律诚信和道德诚信并非同一范畴,研究分析诚信问题的时候不可简单地将二者混为一谈。我国市场经济中诚信缺失问题日益突出,道德诚信的基础不断被削弱。对诚信的期望已不能再仅停留在道德层面,而应该提升到法律层面去构想。解决诚信缺失问题的关键不是道德诚信的再教化,而是建立、健全一套市场经济法律规则,通过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市场经济秩序,并进而建立起人们对法律诚信乃至法律的信仰。

**[关键词]** 法律诚信;道德诚信;诚信危机

**[中图分类号]** D913;B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8284(2003)07-0030-05

近年来诚信的严重缺失给中国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造成了明显的损害。对假烟、假酒、假药等假冒伪劣商品,人们的反映已近乎麻木,于是出现了武汉的“甲醛米粉”、重庆的“福尔马林毛肚”等恶性案件;甚至在当前“非典”病毒肆虐的时期居然有人制造劣质口罩、伪劣过氧乙酸企图大发国难财。以上“诚信危机”的种种表现看似纷乱,实则由于我国实行经济市场化的同时,没有建立一套相应完善的现代化市场规则来规范人们的行为。然而,许多人的思维仍然停留在从伦理的视角去审视它,把伦理道德药铺中能医疗“诚信危机”的千年古方、近代秘籍都翻了出来,试图恢复国人的诚信美德,用心可谓良苦。笔者毫不怀疑道德建设的伟大意义,更无意贬低传统文化的优良,但就当今的“诚信危机”而言,笔者认为道德论者似乎对它认识上有认识上的误区,故有必要对“诚信”进行辨析。

## 一、道德诚信的含义及语源

道德诚信是指作为道德准则的诚信,要求人们言语真实、恪守诺言,强调的是行为人的操守和自律。诚信作为传统道德的基本规范,是儒家文化君子修身养性的首要原则。诚信一词最早见于《商君书·靳令》,但从语源上则是来自“诚”和“信”两个单字。“诚”、“信”二字语义相通,可以互训。据《说文解字》:“诚,信也,从言成声”,“信,诚也,从人言”。可见,在传统意义上,诚即信,信即诚。诚信这种组词方式在古汉语中非常普遍,而对“诚”、“信”、“诚信”的含义也意见基本一致,指诚实无欺,言行一致,遵守承诺等。

中国传统道德中的诚信是做人的自律标准,指人的自我修养和追求的一种精神境界。

**[收稿日期]** 2003-06-02

**[作者简介]** 刘李明(1977-),女,吉林长春人,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助教,从事法哲学研究。

如孔子所言：“信以诚之，君子哉！”荀子所言“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诚信生神”（荀子：《荀子·不苟》）。周敦颐解说道：“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头也。”（周敦颐：《通书·诚下》）诚信是道德的最高境界，从行为规范角度看，需要自律来实现，所谓“吾日三省吾身”、“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这种价值取向是中国传统文化特质所决定的，也是家国同构的“礼治”文化的组成部分，反映的是以宗法家族关系为支柱的熟人社会的道德要求。产生于这种特定文化背景下的道德诚信，是依赖于君、臣、父、子和朋友之间的道德义务，无功利色彩。是一种不假外求而自备于我的德性，是自我实现的道德人格，可以达到超凡入圣的境界，所谓“诚者，圣人之性也”。

西方文化中也有道德诚信，它是建立在契约论基础上社会性的生活准则。诚信是“对承诺和协议的遵守和兑现，如果某人不履行他允诺的事，他就是在恶意行事”<sup>[1]</sup>。这是由于在西方文明史中没有中国传统的家国同构现象，国家的产生即是氏族的消亡，“邻居们开始结为朋友，大家都不再伤害别人也不受人伤害”<sup>[2]</sup>。其社会形成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而维持这种合作的基本道德要求是做到诚信，背离这种道德要求的结果将导致人类社会的瓦解。这里诚信的对象是整个社会上所有互不认识的陌生人（古罗马时期也包括外邦人），而不仅仅是熟人。

中西传统道德诚信的价值指向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是关注个人的修身养性，超凡入圣；一个是关注社会的维持和人类合作。这里存在着深刻的文化差异，形成了不同的诚信理念，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 二、法律诚信的含义及语源

法律诚信作为一项法律原则，是指当代各国在法律上尤其是在私法上普遍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它强调的是规范与监督。例如我国《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合同法》第六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这就是我国民法对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

我国现行民法法源基本上都来源于西方国家。作为民法基本原则的诚信原则也是从西方移植而来。即使从语义上讲，也不是源于我国传统意义的道德诚信，而是来自西方文化中的道德诚信。法律诚信的内涵与外延都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由此导致了中外法学家对法律诚信给予了不同的解释。如史尚宽认为诚信原则应是掌握在法官手中的衡平法，克服法律条文的漏洞，视具体情况按照正义衡平原则适用法律，保证社会公正；施塔姆勒认为法律诚信即为自然法的代名词，以此实现对实在法的监督。笔者比较赞同我国民法学者徐国栋教授对法律诚信含义的界定，即“诚信原则就是要求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维持双方利益的平衡，以及当事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平衡的立法者意志。”“三方利益平衡是这一原则实现的结果，当事人以诚实、善意的心理和行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法官根据公平正义进行创造性的司法活动是达到这一结果的手段。”<sup>[3] (P79)</sup>

法律诚信又可分为客观诚信和主观诚信。由于我国民法受德日民法影响较大，“诚信”所表达的主要是客观诚信，而主观诚信则用“善意”来表达。客观诚信具有以下要点：（1）它是一种课加给主体的行为义务，该义务具有明显的道德内容；（2）这种行为义务的内容为：不在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的界限之外损害他人利益；（3）为了评价主体的行为，要抛弃当事人自己的尺度而使用一个客观标准；（4）但这种客观性不排除对主体故意和过失等主观因素的考虑。以故意或过失行事者不得因客观诚信而免责；（5）这种客观标准由主体

行为和法律标准或典型的中等的社会行为的对比构成;(6)应该考虑主体实施行为的社会背景,寻求可适用的法律标准。”<sup>[3](P83)</sup>现代意义的法律诚信不应局限于民法的范围,也应该适用于一切其他法律部门。

### 三、两种诚信辨析

我国社会上对“诚信危机”的种种议论,多半混淆了道德诚信和法律诚信,而事实上,如前所述这两种诚信是有本质区别的。

#### (一)我国传统道德诚信的区域性与法律诚信的普适性

中华传统的道德诚信,其语源的基本含义是伴随中华“礼治”文化的生成而生成、发展而发展的。“礼”的要义是确立“君、臣、父、子”的差序格局,即所谓“爱有等差”。诚信也必须服从这一根本要求。在这样一个等级分明的、封闭的熟人社会中,诚信没有平等和公平的含义。在具体的践行中诚信中又派生来不同的要求和标准,如臣对君的标准是“忠”,子对父是“孝”,妇对夫是“贞”,如此等等。所以中国传统的道德诚信与西方建立在契约精神、平等精神基础上的道德诚信也完全不同。“礼治”文化背景的道德诚信是对人的而不是对事的,是对家族或亲情团体的而不是普遍适用的。北大的张维迎教授曾说过:中国人的市场竞争,信用制度为零。这种建立在个人与他人的身份基础上的诚信只能是情感化的,情境化的,是区域性的,在熟人和关系圈里都很要面子,讲诚信;在陌生的环境中就可以不顾及面子。我国经济实行市场化以来屡禁不止的造假现象在某些地区是公开进行的,甚至被作为利税来源加以保护,这种现象就只有用道德诚信的内外有别才能解释。

法律诚信是基于商业伦理的民法基本原则之一。它是陌生人之间的行为准则。它就人群与地域而言都是开放的。而对中国传统道德来说“五伦之外的一般社会成员之间应遵循何种伦理准则,在传统伦理学中几乎是一个空白”<sup>[4]</sup>。基于罗马法和基督教传统的西方伦理完全不同,西方人的理念是,每一个人对其他的任何人都具有基本的社会责任。这种社会责任实现的手段是社会契约,表现为互惠和合作。西方文化中的法律诚信具有普适性,因此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得以全面展开,这种契约基础上的法律诚信也是市场机制得以维系的首要条件。

#### (二)中国传统道德诚信的虚伪性与法律诚信的实践性

中国传统道德的差序格局还表现为严格的身份等级,直至极端化为“礼不下俗人”。这就意味着那些为柴米油盐终日奔波的俗人们是“非礼勿——”教化的化外之人,他们另有一套自己的价值标准系统。“君子不言利”,因为前提是他们没饿肚皮,才有心情“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而“小人”们是要言利的,因为他们如果谋不到利,就要去采野菜填饱肚皮。所以中国又自古就有“有钱能使鬼推磨”的道德哲学,并且这种哲学不仅在老百姓中流行,而且也被“君子”阵营里的人做成了《钱神论》一类的精彩文章,当然这是非主流文化。而中国的文史典籍,虽然通篇都是道德文章,但“言”与“行”的背离暴露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德诚信的虚伪性的一面。这对中国人自己已见怪不怪,或者称为“民族无意识”了<sup>[5]</sup>。中国传统道德理论与实践的背离根源在于这种伦理是圣人的而不是常人的,是抽象的理想主义。忽视人性,不能成为老百姓实际社会生活行为准则。生发于传统礼教的道德诚信,只是标榜着一种超凡的“境界”,它不仅无视商人牟利行为的正当性,也否定一般平民百姓对自身利益的维护,所以在面对世俗生活时不仅丧失了约束力,甚至由于自身的不诚信而显得很荒谬——导致“论心不迹,论迹不心”之类的二元化标准。所以这种道

德诚信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构建的诚信,也不是法律诚信的道德基础。

法律诚信作为法律术语和民法基本原则来自异质文化,是西方社会契约论要求的社会性生活中对承诺和协议的遵守和兑现,是以古罗马人的商业道德形态存在并引申进入成文法之中,它不具有使人成为品德高尚的圣人的功能,而是让所有普通人在社会经济交往中公平地行使权利和义务,等价交换公平交易,谋求当事人及当事人和社会之间利益的平衡。所以法律诚信不是我国传统道德那种个人修身养性的标准和内心信念,而是针对每一个介入市场活动的主体所设定的外部约束机制。就一般市场主体而言,他们有着各自的利益,也有不同的信仰和道德取向。他们基本上是亚当斯密定义的“经济人”(本文中“经济人”只是作为“君子”和“圣人”的参照)。他们被允许,自己也试图最大化的谋取利益。当然他们必须遵守约定的规则以保证公平和秩序并且这一规则有国家强制力保证,这就是法律诚信。对于“经济人”的本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以他们在面对30%的利润和300%的利润时的表现给予了深刻生动的说明,在财富面前他们不仅可以抛弃诚信,而且甘冒犯罪的风险。财富对人性中恶的诱发,一般说来道德约束无能为力,北大的张维迎教授在一个关于信誉问题的讲座上,最后一句话是“如果一个人不要脸的话,你對他什么办法也都没有。谢谢!”<sup>[6]</sup>可见,诚信还是要以法律的名义,这是古罗马人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在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法律诚信成为维护市场秩序的基本准则。

### (三)中国传统道德诚信的自律性与法律诚信的制度性

中国传统道德诚信是人的自我修养和追求的一种精神境界,是自我实现的道德人格,是做人的自律标准。它对行为人的约束是由内而外的,完全是一种自我要求与克制,是一种源于内心的自我约束。违反道德诚信而失信于人,可能会遭受舆论的谴责和良心的诘问,但是不会受到任何外在的惩罚和损失。

法律诚信是制度诚信,制度诚信又可叫做形式诚信,这种诚信是可预期的,它来自于制度的保证。法律诚信作为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源于古罗马诉讼中一项司法原则。“在这种诉讼中,承审员可斟酌案情自由裁量,根据当事人在法律关系中依诚信应标的标准调整其权利义务,不必严守法规和拘泥形式,而按公平正义的精神为恰当的判决。”<sup>[3](P100)</sup>在我国现行的民事法律中,诚信原则也不仅仅是对民事主体的法律规则,它也是一项司法原则,这既体现了立法者的意志,也是赋予法官以自由裁量权,用以弥补法律的漏洞和限制私权的滥用。法律诚信更多体现为一种外部约束机制,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如果违反制度诚信而失之于法,则会受到法律的惩罚。

总之,上述关于道德诚信和法律诚信的辨析表明,无论从哪个角度上法律诚信都不是我国传统道德诚信向法律领域的延伸,它们是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两个不同的概念,而仅仅由于文字表达的相同,使很多人对其产生了混淆和误解。

## 四、结论

通过诚信辨析,可以看出“诚信危机”的各种现象,都是我国实现市场经济制度以来出现的消极社会现象,属于商业伦理范畴,本质上是法律诚信问题,而非个人道德问题。市场经济运行的大量事实说明,一个个人德性很差的人未必在市场经营中不讲诚信,因为那样他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被赶出市场,无生存之地。这已经不是个人道德上选择做“君子”还是“小人”的问题,而是这个社会能不能生存的问题。

很多道德论者误解了与法律诚信对应的商业诚信,他们或者说“道德诚信上升为法律

诚信”,或者说“法律诚信来自道德母体”云云,于是开出了“回归道德”等疗治诚信危机的药方。良好的道德对社会的进步作用毋庸置疑,但首先要清楚这里的诚信所指的既不是儒家理论也不是雷锋精神,而是指现代社会普通公民的契约精神、商业道德。在利益多元化、道德多元化的全球化时代它是中性的、人人都可以做到而且人人也必须遵守的。

适应市场经济,打造诚信中国,关键不在于吃“五千年礼仪之邦”的老本,而在于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首先,要规范政府的行为,有效控制政府权力,加强监督机制,避免各级政府信用不良,纵容包庇造假行为,以权谋私。其次,加强公民的信用管理体系。利用中国较完备的户籍管理系统和先进的网络技术、电子识别手段使每个公民的信用记录尽在掌握之中,使之在公民的生活中发挥必要的约束作用。此外,很多有识之士都指出建立诚信机制的关键是给欺诈者以重罚,使其望而却步。如经济学者李爱国先生提出“诚信应视为不对称信息市场的一种特殊商品,其价格的决定与普通商品不同,诚信的价格是欺骗的成本。这种替代关系在市场交易中具有普适性,在诚信机制不健全的条件下,市场博弈的最优选择是即使对诚信的人也会选择欺骗,因为诚信的价格不高,即欺骗的成本很低,于是欺骗必然成风。”<sup>[7]</sup>所以只要有效地大幅度地提高欺骗的成本,诚信价格必然提高,此时欺骗便不再是最优选择,而诚信将成为市场博弈的首选。这就要求我国遵循法律诚信的原则建立一套完备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并进而在全社会民众心中建立起对法律诚信乃至法律的信仰,形成一种现代社会法律诚信文化。

#### [参 考 文 献]

- [1] 徐国栋.客观诚信与主观诚信的对立统一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2001,(6):110.
- [2] 卢克莱修.物性论[M].方书春,商务印书馆,1981.330.
- [3] 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79.
- [4] 沙莲香.中国民族性(一)[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48.
- [5] 张维迎.千年论坛·思想无疆[M].海口:海南大学出版社,2002.365.
- [6] 苏亦工.诚信原则与中华伦理背景[J].法律科学,1998,(3):50.
- [7] 李爱国.诚信的价格与人格的基本假设[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2,(3):11-13.

### Differentiate and analyze law honesty and moral honesty

Liu Liming Feng Yunxia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Hae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50001)

**Abstract:** Moral honesty is a moral criterion, which asks people to be honest and self-discipline. While law honesty is a common law principle of most modern countries. There are many differences between moral honesty and law honesty. Now honest crisis has appeared in our market economy, and moral honesty has been weakened.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o solve the problem is to set up a suit of perfect law rules to keep the order in the market, and then establish the faith to law honesty and law in people's heart.

**Key words:** law honesty moral honesty honest crisis

[责任编辑:张 毫]